

口译规范的描写研究:口译研究新的突破口

王斌华

(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及双语学系, 香港)

摘要: 译员的口译行为及表现主要由三个变量决定:口译能力、现场认知处理条件、口译规范。长期以来,口译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口译认知处理过程的研究,研究方法多采用“脱离语境的”模拟实验方法,而对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真实口译行为和活动及其涉及的诸多因素和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至今未有深入的研究。文章梳理了关于社会文化语境中真实口译活动的研究脉络,对口译规范研究的早期探索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指出口译规范研究对于口译研究的方法论有突破意义,进而提出了口译规范描写研究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 口译研究;口译规范;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0823(2012)04-0043-06

近年来,随着国内口译职业和口译教学的蓬勃发展,口译研究亦呈兴旺之势。从国际范围来看,口译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萌芽,至今有60多年的历史,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发表,但其理论基础薄弱,较为成熟的理论只有巴黎高翻的“释意理论”。长期以来,口译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口译认知处理过程的研究。虽然近年来通过跨学科的方法借鉴,口译认知过程研究出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成果,但我们必须看到,此类研究的数据收集多采用“脱离语境的”(decontextualized)方式及模拟实验的手段,缺乏研究的“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口译研究要继续发展,研究视角和方法都需要有新的突破。

实际上,口译行为不仅仅是像“释意理论研究范式”所关注的那样,是一个从源语中提取意义并转换成目标语表达的过程,也不仅仅是像“认知处理研究范式”所探索的那样,是一个复杂的认知处理过程。要对口译行为进行充分的描写,不仅要考察口译过程中译员的内在思维过程,而且要把口译活动的外部环境和制约因素纳入研究视野。正如波赫哈克(Pöchhacker)(1995)指出的那样,过去一直处于口译研究中心地位的对口译认知处理机制的研究并不能完全代表口译研究的整体,而对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真实口译行为和活动及其所涉及的诸

多因素、乃至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至今仍未有深入的研究。

本文将讨论口译规范研究在对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中真实口译行为和活动的考察方面的方法论意义,指出口译规范研究有望成为口译研究新的突破口。

1. 口译研究的发展趋势:对社会文化语境中真实口译活动的研究

通过对口译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对社会文化语境中真实口译活动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安德森(Anderson)发表于1976年的文章“译员角色面面观”。在该文中,安德森强调,评判译员的角色及其口译表现应与现场真实的社会文化及口译互动的语境结合起来。他认为,口译活动“发生于社会情境中,对这种情境应进行社会学的分析”,而且,“任何具体的社会情境都可能会对译员的角色及其口译表现施加一定的影响”(1976/2002:209)。无独有偶,科奇霍夫(Kirchhoff 1976)也同时撰文指出,应该把口译看作是一种交际行为来进行研究,研究的对象应包括口译的即时场景和社会文化语境。

在安德森(1978)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中,他采访了17位受访者(包括“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译员、学生译员以及两位临时译员),调查他们如何看待“与客户的身分保持一致”(identification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40092);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DXM74003)

作者简介:王斌华(1974-),男,博士,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研究),研究方向为口译理论与实践。

with their customers)的问题。所有受访者均认为,忠实地传递客户的信息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而且强调在口译中选择“一边倒”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然而,在进一步的采访中,当安德森要求他们根据各自的口译实际经历来回答这一问题时,多数受访者都提到,在一些实际情形中并不容易做到与客户身份保持一致。对比以上两种回答,我们可以发现,口译行业规范所认定的译员角色与他们在实际口译活动中的行为也许并不完全一致。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首先是斯坦泽尔(Stenzl 1983:48)在其论文中提出,对口译的研究应该有一个全面的整体模式,不应该把口译仅仅看作是一系列的思维操作,而应把口译看作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这样,口译研究的对象就涵盖了处于口译活动场景和语境中的意义、发言人和听众等各方。斯坦泽尔(1989)进一步指出,在口译活动中,译员所受到的约束(constraints)不是仅仅依靠认知心理学研究路径就能全面解释的,因此,她明确提出,需要对口译研究进行重新定向,拓宽研究框架,把口译置于整体的交际过程和语境中进行考察。斯坦泽尔的这一在当时极具前瞻性的研究立场在今天仍然得到口译研究界的代表人物吉尔(Gile)和波赫哈克的肯定。波赫哈克(1994:235)指出,斯坦泽尔(1983:47)所说的“实际上口译研究还未能做到对实践中的口译现象进行系统的观察和描写”的状况直至上世纪90年代仍未有根本的改变。吉尔(1998)也曾多次呼吁,口译研究仍需多进行系统的观察和描写研究。

1989年,希莱辛格(Shlesinger)率先在翻译学的旗帜刊物《Target》第一期上撰文,探讨把“规范”(norms)这一描写翻译学的核心概念和研究工具延伸到口译研究中的可能性。虽然她当时认为这只是一次尝试,但她的这一呼吁陆续得到了响应(包括Harris 1990, Schjoldager 1995, Gile 1999a, Garzone 2002等)。不少口译研究者都认同,应该对真实情境中的口译行为作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以探索“口译规范”。

其后,施卓德杰(Schjoldager)(1995)也强调了研究“口译规范”的重要性,并呼吁对口译行为进行描写研究。她指出,过去的口译研究过于突出了对口译的认知处理制约(cognitive constraints)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潜藏于口译活动背后的“口译规范”的研究。在另一项小型研究中,她试着探索了口

译行为的一些规律,认定“恰当的替换”(substitution proper)可以被看作是一项“口译规范”,该规范意味着译员在口译中倾向于使用与源语语言项不太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目标语语言项,主要是为了使目标语语言项在目标情境中更为恰当。

口译研究界的代表性研究者吉尔(1999a)也在谢芙娜(Schäffner)组织的一场当今翻译学界名家参与的专题研讨中撰文强调,口译研究界有必要重视以往口译研究视域中被忽视的“口译规范”,以拓展研究者的视野,在口译研究中引入社会性研究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事实上,在他1991年发表的关于翻译(Translation,包括笔译和口译)评估的一篇文章中,吉尔亦曾指出,“既然职业翻译产生并受控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在翻译质量评估中社会文化环境的因素理应成为重要的因素”(1991:95)。

口译研究界的另一位代表性研究者波赫哈克(1992,1994)更强调口译研究的“语境化”(contextualizing),在其近年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均对口译的场合和语境因素有不同程度的强调。他认为,会议口译语篇应被看作是一种“场合和文化情境中的语篇”(text-in-situation-and-culture),研究者应从结构、信息、功能以及文化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综合性研究。关于口译研究的视角,波赫哈克指出,“在过去的口译研究中,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口译行为的语言加工和认知操作进行心理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研究上。不可否认,这些研究对于口译理论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但是,口译研究及其理论不应停留于此。如果我们把口译看作是一种在跨文化互动的特定场合进行的以功能性目标语篇产出为目标的社会行为,这将会大大拓展我们研究视域,并有利于构建口译的学科理论”(1992:217)。

对口译的社会文化语境在研究中的地位最强烈的呼声来自克罗宁(Cronin)(2002)。他指出口译研究界不应该对翻译研究中近年的理论发展无动于衷,强调对口译活动应该进行语篇、文化、权力操控等各个角度的研究,注意口译活动所在的“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2002:391)。为此,他甚至提出口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2. 口译规范的概念来源及早期探索

2.1 口译规范的概念来源

“口译规范”这一概念来源于描写翻译学的核心概念工具——“翻译规范”。图里(Toury 1980、

1995)等倡导的描写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致力于建立基于方法论和系统描写的翻译学分支学科,使其具备一般实证学科的特点,使翻译研究科学化和学科化。图里(Toury)(1995:9)指出,描写研究有两大任务——描写现象和建立法则。以描写翻译学为例,对翻译现象的描写即描写体现规范的翻译过程、行为、翻译结果(译本)。描写的目的是归纳出规范,揭示翻译现象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性,进而发现翻译的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建立翻译的一般法则。

描写翻译学把翻译活动置于其社会文化语境中来进行研究,把翻译行为看作是一种受规范支配的(norm-governed)社会行为。规范是“某个社会群体共同的价值观和思想转化为适合或适用于具体场合的行动指南”(Toury 1980:51),规范“不仅约束人的行为,同时也为社会认可的正确行为提供指导”(Schäffner 1999:7)。

参照图里(1995)关于“翻译规范”的定义,我们可以把“口译规范”界定为:对口译行为和口译活动进行描写研究的一个概念,即具体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口译职业群体以及口译服务对象群体共享的价值和观念,是口译过程中普遍接受的口译方法与策略,是关于什么是正确的、适当的口译行为原则的观念。

口译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是受规范制约的。口译规范是内在化了的规则,体现某一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对行为的制约。规范在口译过程、口译行为和口译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现场口译的各种策略和现场译员的各种决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规范的支配。

2.2 口译规范的早期探索

最早提出把翻译规范理论延伸到口译研究中去的是希莱辛格(1989:111-115)。在《Target》第一期的“论坛”专栏,希莱辛格以一篇短文探讨了把规范理论应用到口译研究中的可行性。但是,她的文章与其说是提出一种尝试,倒不如说是表示对其可行性的怀疑。她列举了这种研究在方法上的一些障碍(methodological obstacles):口译不太可能形成群体性的“规范”;口译研究中文本语料几乎不存在;论述“规范”的文本外(extra-textual)语料也很少;要监测口译过程也很困难等。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困难实际上并非只存在于口译的“规范研究”中,而是各种路径的口译研究都必须面对的困

难。

在《Target》第二期的“论坛”专栏,另一位口译研究者哈里斯(Harris)马上作出了回应。他认为,希莱辛格的怀疑和担忧完全没有必要,“任何熟悉口译活动的人都可以举出几条口译规范来”。他举例说明,如口译中的“诚实代言人规范”(the norm of ‘honest spokesperson’):译员在口译中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发言人的意思时,表达方式应力求准确,而且不能有明显的省略,也不能把自己的思想混入口译之中(1990:115-119)。

遗憾的是,哈里斯并未对希莱辛格所列出的研究方法障碍作出回应。对此真正作出回应的是口译研究界的代表人物吉尔。在吉尔的文章中(1999a:99-105),他首先强调了口译研究中“规范研究”的必要性,进而指出:长期以来口译研究在考察口译表现(interpreting performance)时,盛行实证调查的研究方法,评估译员表现时往往基于源语与目标语的语言比较,而对口译策略所发挥的作用重视不够;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往往把目标语相对于源语的偏离(deviation)归因于译员的“认知负载过重”(cognitive overload),而忽视了译员可能有意使用某种口译策略以达到优化目标语表达及目标语交际效果的原因。他指出,口译策略至少是部分“基于规范的”(norm-based)。如此看来,“规范”是口译表现和评估研究中一个被忽视了的重要变量因素。

对于口译策略背后“规范”的作用,吉尔举例说明,一些口译策略的选用可能基于以下“规范”(参见Gile 1995:201-204):第一,最大程度地还原源语的信息;第二,最大程度地发挥目标语的交际影响力;第三,最大程度地降低对信息还原的干扰。吉尔还特别指出,“忠实规范”在口译评估研究中有其重要的地位,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在评估口译是否“忠实”时,并不是单纯地基于源语和目标语的语言比较中的“命题匹配”(propositional matching);而且,从有关口译评估的调查结果来看(Gile 1999b),不同的译员和用户群体对“忠实”的看法均呈现一定的变数(variability)。由此看来,口译的“忠实规范”应得到更全面的考察和描写。

吉尔(1999a)还对希莱辛格(1989)关于口译规范研究可能遭遇“方法障碍”的质疑作了回应。他指出:第一,译员往往都是和同行一起工作的,肯定存在群体性的“规范”;第二,译员的培训过程就是一

个初步习得“规范”的过程，因为口译教师往往自身也是译员，其对学生口译表现的评点就是一个展示“规范”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往往是在学生群体的课堂上公开进行的；第三，口译的规范研究不一定要基于大型的目标语语料库，更有效的研究方式可以是采访译员，问他们所遵循的“规范”有哪些；阅读口译的教学文献，看其中陈述的“规范”是什么；分析用户的回应，看他们认为译员应遵守哪些“规范”；让其他译员来对目标语文本进行评估，看他们衡量的标准有哪些等。

施卓德杰是到目前为止第一位把翻译规范理论运用到口译研究中的研究者，她于1996年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重点进行了“基于规范理论的源语-目标语关系的分析”(参见pöchhacker 2002:300)。但是，她的研究只涉及源语-目标语的“关系规范”，而且数据收集方法采用的是模拟实验的方法，这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看作是口译活动的“规范描写”，还受到质疑。实际上，正如她对自己的研究方法作反思时所说，她的研究直至数据收集完成阶段的研究目标都还未定位为口译规范的研究(参见Schjoldager 1995:65-87)。

从以上文献梳理来看，关于口译规范的早期探索多为“浅尝辄止”，未见深入探讨，更未有系统的基于数据的描写性研究。

3. 口译规范的描写研究

3.1 决定口译行为及译员表现的主要变量

口译现场译员的口译行为是受译员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制约的，其口译表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译员不可能想怎么译就怎么译，也不可能简单地在任何场合都以忠实于源语为唯一的口译行为标准。作用于口译行为的因素主要有：

A) 译员的口译能力。包括译员的双语能力、译员的知识背景、译员所掌握的口译技能。译员的口译能力决定了译员现场口译行为和表现的潜势(potential)。

B) 口译现场的认知处理条件。译员在口译现场进行“多任务操作”(multi-tasking)的复杂认知活动时，其口译行为的结果还受到口译现场认知处理条件的制约，包括：现场发言人的语速和口音、源语的信息密度和内容难度等。当发言人语速过快或源语的信息负荷过大时，即使是口译能力较强的译员，也有可能因为认知负载过大(cognitive

overload)而影响其口译表现。

C) 口译规范。口译规范作为口译职业群体以及口译服务对象群体共享的价值和观念，是内在化的规则，现场口译的各种策略和现场译员的各种决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口译规范的支配。作为一个职业群体，译员对其职业行为已形成了一定的职业规范，如国际上代表性的“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即制订了两份纲领性文件——“(会议口译员)职业标准”(Professional Standards)和“(会议口译员)职业道德守则”(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要求其会员必须遵守。即使不是“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会员的职业译员，在其接受口译培训时，口译教师的“言传”及“身教”也会使口译规范“内化”到其将来的职业行为中。

以上分析了作用于口译行为及其表现的三种主要因素，它们对口译行为及其表现的作用可以用图1来表示。已有的口译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因素A和因素B上，而对因素C即口译规范的系统研究目前几乎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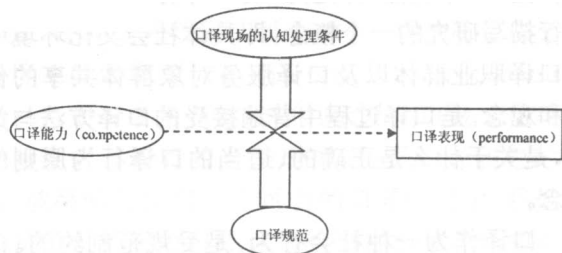


图1 决定口译行为及译员表现的主要变量

3.2 口译规范研究的意义

“口译规范”的研究视角呈现给我们一幅把口译活动还原于其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复杂的画面，这正是“翻译理论研究范式”(TT paradigm)对于口译研究的意义所在。正如波赫哈克指出的那样，“翻译理论研究范式”关注和分析的主要对象是语篇产品，这种分析涵盖了结构和语用的层面(Pöchhacker 2004:76)。换言之，在“口译规范”的研究视角中，译员的目标语产出不再只是反映认知过程的窗户，而是以译员为中介的涉及多方的宏观交际过程的产品。从这一角度进行的研究也许能拓宽口译研究的视野，给口译研究带来新的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口译规范研究对于口译研究的范式意义正在引起口译研究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在口译研究界跨世纪的福尔里口译研究大会上(主题为“21世纪的口译”)，嘉松(Garzone)(2002:

107-121)专门撰文阐释“规范理论”对于口译质量研究的意义。他指出,不仅译员行为是有规范基础的,而且用户期望也是基于规范的。以往的口译质量研究或以源语-目标语的语言比较为手段、或以理想的口译质量标准为基础、或以用户期望为准绳,因而往往与真实的口译现场有距离,或评估参数过于片面。若以“规范理论”为框架,口译质量则应定义为“体现口译规范的一个概念,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具体的口译表现应具备的内部和外部的理想特性。”(2002:110)

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口译的质量研究就能做到还原口译的具体语境,质量评估的参数设定也会更为全面。在“规范理论”的视域中,口译质量研究不再是为了寻找一个表面的、生硬的、绝对的、普遍的口译质量标准,而是要考察口译活动的参与各方是遵循怎样的“规范”而就口译的质量达成妥协的。这样的研究范式也有利于考察具体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口译的“规范”和“质量标准”是如何变化的。与其求一个也许并不存在的单一的“同”,不如存其事物本来所具备的复杂的“异”,并对“异”进行客观的描写,这正是以“规范理论”为核心的描写翻译学对于口译研究的意义所在。

“口译规范研究”是从社会的角度把口译行为还原到其所在的社会、文化、交际的真实语境中进行的描写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还原了口译活动的社会/文化复杂性,而且对于口译教学和口译实践同样具有意义。口译教学的内容不仅应该包括口译的思维和操作技巧,而且应该包括以口译规范为基础的口译策略,以及具体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的口译规范。对于口译实践,口译规范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译员的口译行为提供指导,并且可以为口译评估和译员认证提供依据。

3.3 口译规范描写的理论框架

“译员”是口译行为的主体,“发言人”和“听众”之间通过译员的口译行为达成跨语言/文化的交际目标。译员的口译行为受口译规范支配,译员所遵循的口译规范一方面来源于译员这个社会职业群体中形成的关于译员职业行为的共识性规范,同时也是译员群体与源语发言人、目标语听众以及会议组织者/雇主等口译用户之间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协商式规范。

“口译规范”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进行描写(如图2所示):“源语-目标语关系规范”、“目标语交际规

范”、“译员职业伦理规范”。具体的描写角度包括第一,源语-目标语关系规范的描写。主要通过源语和目标语的语篇际比较进行,描写角度包括:意义的一致度、信息的完整度等。第二,目标语交际规范的描写。主要通过目标语的语篇内考察来进行,描写角度包括三个方面,语言形式(语言的合乎语法性、句法组织);交际功能(表达的适当性、话语的逻辑性、交际效果);发布方式(清晰度、流利度等)。第三,职业伦理规范的描写。主要通过考察口译活动的副语篇(即译员关于其口译活动的总结反思文献)进行,描写角度包括译员角色定位;译员对口译活动的职业“忠诚度”;译员职业道德等。



图2 口译规范描写的理论框架

4. 结语

本文阐述了口译规范研究的背景,对口译规范研究的早期探索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口译规范研究对于口译研究的方法论突破意义,进而提出了口译规范描写研究的理论框架。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另文(Wang 2012)报告一项基于较大规模语料的口译规范描写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 Anderson, R. B. W. 1976/2002. Perspectives on the Role of Interpreter [A]. In Pöchhacker and Shlesinger (eds.)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Anderson, R. B. W. 1978. Interpreter roles and interpretation situations [A]. In Gerver, D. & Sinaiko, H. W. (eds.) (1978)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 New York and London: Plenum Press.
- Cronin, M. 2002. The empire talks back: Orality, heteronomy and the cultural turn in interpreting studies [A]. In Pöchhacker, F. & Shlesinger, M. (eds)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Garzone, 2002. Quality and norms in interpretation [A]. In Garzone, G. & Viezzi, M. 2002. Interpreting in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Gile, D. 1991. A Communication-Oriented Analysis of Quality in Non-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A]. In M. Larson(ed.),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ension and Interdependence[C].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Gile, D. 1995.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Gile, D. 1998. Observational Studies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ing[J]. Target. 10(1): 69-93

Gile, D. 1999a. Norms in Research on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A Response to Theo Hermans and Gideon Toury[A]. In Schaffner, C. (ed.) 1999. Translation and Norms[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Gile, D. 1999b. Variability in the perception of fidelity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J]. Hermes, Journal of Linguistics. No. 22.

Harris, B. 1990. Norms in interpretation[J]. Target. 2(1): 115-119.

Kirchhoff, H. 1976/2002.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Interdependence of Variables in the Interpreting Process, Interpreting Models and Interpreting Strategies[A]. In F. Pöchhacker and M. Shlesinger (eds.)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11-119.

Pöchhacker, F. 1992. The role of theory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A]. In C. Dollerup & A. Loddegaard (eds.)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

preting. Training, Talent and Experience[C]. John Benjamins, pp 211-220.

Pöchhacker, F. 1994. Quality assurance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A]. In Dollerup, (ed.)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2[C]. London & New York: John Benjamins.

Pöchhacker, F. 1995.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 Functionalist Approach[J]. Hermes, Journal of Linguistics. No. 14: 31-53.

Pöchhacker, F. 2004. Introducing to Interpreting Studie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chjoldager, A. 1995.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ranslational norm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J]. Hermes, Journal of Linguistics. No. 14: 65-87.

Schäffner, C. (ed.) 1999. Translation and Norms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Shlesinger, M. 1989.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to interpretation: norms as a case in point[J]. Target 1: 111-115.

Stenzl, C. 1983.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Groundwork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Model[D]. MA thesis, Birkbeck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Toury, G. 1980. In Search of Translation Theory [M]. Tel Aviv: 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Toury, G. 1995.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Wang Binhua, 2012 forthcoming. A Descriptive Study of Norms in Interpreting[J]. Meta, 57(1).

Descriptive Study of Norms in Interpreting: A New Approach to Interpreting Studies

WANG Bin-hua

(Department of Chinese &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preter's interpreting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is shaped by three major forces: interpreting competence, cognitive conditions on the site and norms in interpreting. For the past 60 odd years in its history, interpreting studies has focus on the exploration of cognitive processing in interpreting, featur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de-contextualized" simulated experiments. Meanwhile, there is the lack of studies into authentic interpreting behaviors and activities in real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thin vein of studies into authentic interpreting behaviors and activities in real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It proposes the descriptive study of norms in interpreting as a way to make new breakthroughs in interpreting studi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also designed for the descriptive studies of norms.

Key words: interpreting studies; norms in interpreting; research methodology